

宛大妈是公园凉亭戏迷聚唱的核心人物。她曾唱一段《贵妃醉酒》的四平调,众人听完不禁面面相觑,怎么跟梅兰芳的唱法大相径庭?她告诉大家,那是苟慧生还用白牡丹艺名时候的唱法,后来这出戏被公认为是梅老板的代表作,苟老板就再演过这一出了。据她说,苟慧生的唱法,是从老一辈的巨角名家路三宝的行腔里演化来的。于是有人问她:“您是北京京剧团的吧?”她说:“我曾

是北京市京剧团的龙套,角儿唱杨贵妃,我是八宫角之一。”完了又解释一句,听起来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大家糊涂,这什么意思啊?她笑着细掰:“四五十年前,北京有两个市一级的京剧团,一个叫北京京剧团,后来成为排演《沙家浜》《杜鹃山》的‘样板团’,另一个,叫北京市京剧团,那政治地位、福利待遇,跟‘样板团’可就差老鼻子啦,我呢,是在带‘市’字的那个团,所以,当时北京戏剧界就流行这么一句话,叫做‘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当然啦,改革开放以后,又合并在一起,叫北京京剧院了。”那以后,有的人背后就用“多一事”称呼她。

社区居委会有的人觉得她这个老态婆脾气有些古怪。那年两位居委会女士抱着捐款箱,敲响她那单元的门铃,说是知道社区里有些老人腿脚不便,想给灾区捐钱,却心有余力不足,所有上门来满足其心愿,宛大妈听了却摇头说:“我不做隔山打牛的善事。我行善,要面对当面,知道我捐的,究竟落在了谁头上。”两位女士已经收到若干捐款,而且许诺将在社区公告栏公布捐款明细表,并会全部转交有关机构,宛大妈的表现令她们气闷。

有一次宛大妈去医院看病,候诊的时候,见旁边一个外地汉子,给一把旧椅子装上轱辘,推他媳妇来看病,问起来,他媳妇是生了骨瘤,动过手术,今天复查。给媳妇治这个病,快到倾家荡产的地步。他哥哥也在北京来打工,母亲轮流在他们两家住,这个月又轮到住他家,所谓家,就是在几里外,用每月

400元租的原来工厂的排房,小小一间,放架底下双人上头单人的高低铺,剩下空间也就放套煤气灶架和一张用来吃饭和孩子做功课的桌子,不过有彩电,屋顶上有“锅”,能看电视。他哥哥的意思,是弟媳妇得了这么个病,母亲就别挪弟弟那儿了,嫂子却不干,认为该轮还要轮,他妈跟那嫂子一向不睦,倒很愿多在他那儿住。他那媳妇衰弱得说话也缺气,一旁管自摇头,好不容易憋出句:“就你话多。”他苦笑,闭嘴前忍不住又来一句:“明天赶紧去工地复工,问工头再支点,要不买来的钱也没了。”宛大妈看完病领完药,在医院外面又遇见他们,就过去跟那汉子说:“让你媳妇等在超市门口,你跟我进去,我帮你把该买的买了。”见那汉子犹豫,就说:“我是真心要帮。你接受了是给我快乐。”汉子就把媳妇坐的轮椅安置在妥善位置,跟宛大妈进了超市,两人各推一辆购物车,宛大妈往汉子的车里装了一袋米、一

袋面、一桶玉米油、一大盒鸡蛋、一桶酱油、一桶醋、一包紫菜、一袋虾皮……汉子直说:“谢谢谢谢,够了够了。”她最后还往里添了两罐辣酱。出了超市,她跟汉子说:“我每月5号上午10点必来这个超市。你以后有困难可以按时候到这儿来找我。我不会给你钱。我不会给你买别的。就是给你买这些个最必须的日常嚼用。”汉子和他媳妇连声道谢,问她:“大妈贵姓?”她笑:“莫问我的名和姓,就记住仨字儿吧:多一事。”

“多一事”的趣事很多。那天她来公园,推了个自备的帆布小购物车,里头是两提卫生纸。先没去凉亭唱戏,先推到公厕外的松树下守着,不一会儿,一位大嫂出来了,她迎上去问:“又把厕纸整卷儿全搂走啦?”那大嫂就知道被盯上了,脸上有些个搁不住,嘴里硬撑着:“你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对不对?”又有一位胖老头从里头出来,他跟那位妇女一样,也是几乎每天都要来这公厕收集厕纸的,管理人员刚续上,他们就很快整卷搂走,其他游客往往无纸可用,意见很大。宛大妈见二位占便宜的

的全在眼前,就说:“道理你们也懂,不说了。今天我带了一提10卷的名牌厕纸来,赠你们每人一提。只希望你们从此以后能保障其他游客的权益。”那大嫂不知所措,那胖老头却理直气壮:“你多什么事!我们这算什么问题?你能耐你逮那些也要官去!”宛大妈说:“大贪要反,小贪也要戒。端正社会风气,大事小事全要做。当年我演不了贵妃,就演好那宫女。如今我还是唱不了主角,干不成大事,可是我还能做点小的好事。我真是想送你们厕纸,好让你们生出点子悔意,赶明儿别再这么贪小啦!”那大嫂和那胖老头灰溜溜地绕开她走了。后来管理员说,白楼厕纸的现象少多了。

凉亭里又响起宛大妈的唱腔,这回唱的是《穆桂英挂帅》:“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唤起我破天门壮志凌云……我不挂帅谁挂帅?我不领兵谁领兵?”

老上海的影楼是上海开埠后市井文化的独特景观。研究这段历史,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上海城市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变迁。

自1839年8月法国布景画师达盖尔发明银板照相法,1840年美国人率先在纽约创办全球第一家照相馆后,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照相机和摄影技术开始传入中国。虽然在中国最早引进摄影技术的是广州和香港,但上海却是开展摄影活动最活跃、发展最快的城市。在上海开影楼先是西人所为,但不久就有了国人自己开的影楼。广东人罗元佑原是上海道台吴健彰手下的会计,被革职后随外国人士摄影,成为上海滩最早的职业摄影师,并于19世纪50年代在上海开了一家专业影楼。据史料记载,19世纪中期在上海比较活跃的影楼有公泰、苏三兴、森泰、宣昌、丽珠等。至19世纪末,上海开设的影楼约50多家,大多集中在今南京东路到广东路一带。

早期的照相使用的绝大部分是玻璃底片(湿片),感光速度很慢,当时又没有灯光和其他人造光,必须利用日光,摄影室一般都在楼上开设,所以影楼当时也叫照相楼。在摄影术进入中国之前,人

品,加上又与科学的发展密切相连,我们是难与好莱坞电影抗争的。当我们把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代表作隔几十年后拿到国际上去看,映时,让观众和评论家惊叹:中国电影的新现实主义竟比意大利电影早了一二十年!新中国成立后所拍的《梁山伯与祝英台》《阿诗玛》等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影片也曾轰动过国际影坛。“文革”后,我国第三、四、五、六代导演均有能问津国际影坛的佳作。

我们应该总结经验,调整心态,面对现实,为中国电影冲出国门继续努力。我认为,我们努力的重心,还是应该放在认真地去塑造好人物,生动地去刻画其性格,深刻地去展现其人性的复杂,真实地去宏扬人性中善的一面。纵观中外

喜欢舞林大会,是因喜欢看台上人跳舞,看他们一个个打扮得漂漂亮亮。我们这代人,当年不许打扮,不懂打扮的奥妙,今天才发觉,打扮,竟有如此奇妙的功能,可以将人的漂亮与性感“提取”出来,发挥到极致。看那么些漂亮性感的人,在荧屏飘来飘去,那是真正的赏心悦目、怡情养心,甚至带给人春心荡漾的感觉。往高度上说,莺歌燕舞也是和谐社会需要,美的东西看多了,灵魂也就平和了、美了。

舞林大会上,出现不少明星。很多人,冲着明星去看这节目,但我不是。我不崇拜明星,特别是男明星,他们再漂亮再性感,于我没感觉,欣赏不了。我承认,是我“不是”。常常,一台上男明星跳得很起劲,我很认真地看,可看半天,忽然晃过神来,发现自己看的不是他,而是他的舞伴。感觉很抱歉。参赛的是明星,不是伴舞的。但有什么办法,女人,就是那么容易跳进我眼帘,跳进了还赶不走,能驻留很久。尤其舞台上的她们,那么优美的线条、优美的弧度、优美的起伏、弯曲、

们要把自己的形象保存下来只能到画像馆请画师画。摄影术进入中国初期,由于照相技术和设备尚不成熟,画像馆和影楼并存了很长一段时间。到19世纪70年代后,随着摄影技术的发展,画像业逐步萎缩。玻璃干片发明后,摄影师可以走出摄影室摄影,并大规模印制所拍照片。一些反映风景名胜的照片可以向旅游者出售,摄影商业色彩日渐凸显。

19世纪80年代后至民国前,上海的影楼多达百家,其中宝记、耀华、同生等尤为出名。宝记创办于1889年,1925年停业,是当时上海地区活动时间最长的影楼。创始人欧阳日芝被时人称为“最有书卷气的影楼老板”。由于宝记几十年如一日视顾客为上帝,因而博得沪上众多普通人家的青睐,康有为曾

说:“沪上之为摄影久且世而外妙者,莫如出欧阳生。”创办于1892年的耀华,除了摄影技术精湛,还特别注重广告宣传,是当时做广告最多的一家影楼。耀华老板施德之还让长女在南京路跑马厅旁设耀华西号,“专拍女照,以便闺阁”,致使慕名而去者络绎不绝。开设在今福州路上的同生影楼,因老板谭京唐交友

历来的电影经典之作,之所以成功的一个主要经验,均不外于此。题材的特色,民族的风采,科技的崭新,场面的宏伟,政见的胆识……虽也是成功的因素之一,但与前者相比,均不是重要的因素,缺了前者,再有特色的影片,也成了经典。电影是通过银幕上的人物与银幕下的观众心情交流之后才产生影响力的。这种交流倘若引起观众对自身经历的联想和共鸣,影响力就产生了。这种联想和共鸣越大,影响力也越大,所谓能不能“感染”观众,关键也正在于此。观众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中外观众,因文化背景的差异,往往对同一部影片会有各异显著的见解,但中国人外国人都

是人,在“人性”上有一种天然的共识。抓住这个共识,去真实、生动、深刻地挖掘,成功就在前面。认清了这一点,不复全世界的电影人无论所处的环境各异,其实还是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

是因为,中国是个讲“中庸之道”、讲人情世故的地方,她竟然在电视机前、面对亿万观众,公然张扬个性,完全逆潮流而行。可意外的是,她还“行得通”。由此是否可见,世

人情并不似想象中那般没原则?没批评,就没进步,这是每个有诚意的人都懂的道理。我由此联想到文学。文学直接和人心、与人的思想情感打交道,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但中国文学的现状,远远落后于舞林大会,

几乎没批评。一方面,专业水准欠佳,一方面,专业精神不够,而恰恰,人性中的顽劣成分与各式利益配合得天衣无缝,玩世不恭的手法,娴熟、通透到了出神入化地步。

当然,金星评委也有过线之处,有时没必要地显露“杀气”,制造紧张空气,“伤害”娱乐气氛,特别对舞林大会总教头方俊的态度,表现得一无尊重、居高临下,甚至给人“欺负”人的感觉。

读罢《红楼梦散套》,十分欣赏,就决定抄下来。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五月,完成《成为和平饭店》的最后一个句号,可巧 timeout 的年轻编辑 Middle-hurst 来找我,说想要做一次文学之旅,一个作家和她故事里的外滩。杂志的十五个读者去看我书里的故事发生地,对我来说,就好像是十年外滩写作的一个用脚走出来的句号。立刻就答应下来了,私心里庆幸能用这样的方式别过外滩。

2003年,中英作家慢火车之旅,上海是始发站,我曾带着中英作家小组,半夜十二点钟开始寻访和平饭店,第二天,寻访新天安堂和黄浦公园,那时我已开始写《外滩,影像与传奇》一书。十年后,三书完成,和我的读者一起去外滩走最后一次,看我小说中的那些地方如何从纸上再回到街上,真有趣。

别过外滩

广泛,在官场中极有人脉。宣统初年,同生被聘进京拍摄光绪帝和西太后葬礼的照片。1929年出版的《总理奉安纪念册》中的照片都由同生拍摄,160幅照片生动记录了孙中山灵柩从北平碧云寺起灵到南京中山陵止的整个过程,成为今天珍贵难觅的重要历史文献。

上世纪20年代后,随着电光日夜拍照技术的使用,拍照价格大幅降低,影楼服务对象由达官显要、名伶名媛、新生豪富普及至普通市民,加之部分影楼还兼为报馆拍摄新闻照片,影楼迅速发展。当时有名的影楼有汇芳、宝芳、兆芳、品芳、维新、京华、美华等,

但名声最大的还是今天人们熟知的王开。王开最早开设于北京,20年代迁移上海。它以“人无我有,人有我精,顾客至上,质量第一”为宗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独占鳌头。当年,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曾去王开留影。上海沦陷后,为适应拍摄“良民证”照片的需要,上海影楼又有扩展。抗战胜利后,由于美国倾销战时剩余物资,大量抛售照相材料,加之国民党接收大员到沪,富商巨贾回城,影楼畸形发展。据1948年同业公会编印的会员名册载,上海在册影楼达382家。

上海解放后,照相业经历了50年代的改组改造,“文革”十年的严重阻滞,“文革”后的恢复发展几个重要时期。进入新世纪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照相市场出现多种经济形式竞争局面,影楼也由规模经营走向集团化。目前,上海在工商注册的影楼、照相馆、摄影工作室达1000余家。

照片是一个时代的表情,是时光最真实的记忆。在研究老上海影楼发展史的同时,迫切需要我们抢救搜集散落民间的不计其数的老照片,并加以社会学和历史学意义上的解读。这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

夜光杯

黄惟群

看舞林大会思绪纷飞

黄惟群

则更多转移到了评委身上,特别是转移到了那个叫金星的女评委身上。

金星,舞蹈家,人称“毒舌妇”。她的点评尖锐、犀利、毫不留情,直指毛病,而且,绝无笑容,连目光都乌黑,一动不动,枪洞一样逼人,语言的毒辣程度,听得人心慌,起汗。初听她点评,本能地不适加震惊。但过后,不适开始变化。她的点评非常专业、非常到位,让人折服,甚至那些连连遭受批评的明星,舞罢曲终,大多都会点名要她点评。至于震惊,

十回谈

享受文化生活

雨茶小
竹西半
雞題錢
啼一消
一屋欲
春醒列
新

书法
钱沛云